

# 吉本道雅《中国先秦史の研究》简介

胡宝华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2005年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出版了“东洋史研究丛刊”的第67册,即吉本道雅著《中国先秦史の研究》。作者现年48岁,任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典型的少壮派学者。记得1988年笔者去京都大学留学的时候,吉本道雅还是一位刚刚读完博士后课程,留校担任东洋史研究室的年轻助手,时光飞逝,二十年后的今天,俨然已成为京都大学的中坚学者。在这期间,吉本道雅以执着的精神在先秦史领域辛勤笔耕,先后在《东洋史研究》、《史林》、《东方学》等学术期刊上发表40余篇研究论文,这部近五十万字的论著既是吉本道雅前半生的学术总结,也是为他摘取京都大学博士桂冠的学位论文。全书共588页,分为三部。第一部“西周期”、第二部“春秋期”、第三部“战国期”。以下对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与观点做一简单介绍。

首先作者在该书的序论“中国先秦史研究的课题”部分,概观了日本战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历程,指出长期以来对日本先秦史研究产生很大影响的是恩格斯提出的“氏族制”观点。现在研究应该跳出这个基础概念的框架,否则是不可能把握住先秦时代的发展特征的。其次,迄今为止先秦史只是在探求产生秦汉专制主义原因方面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作者主张先秦史研究应该从西周、春秋、战国的长时段历史中,搞清在此期间各时代所呈现出的连续与断层的发展脉络与历史原因。

本书的第一部《西周期》只有《西周后期的周王朝:册命金文的分析》一个章节,作者以册命金文为素材考察了西周后期国家制度的发展。作者根据册命金文,阐述了周天子对管内诸侯册命的统治机构的存在方式,即身份制的制订过程。周天子以官职为媒介,将管内诸侯统制在官僚制下,对管内诸侯通过册命给予相应的身份,授予具体的职务以及在王畿享有的权益等。作者依据已故京都大学先秦考古学教授林巳奈夫的青铜器考古学断代研究观点,对西周各个时期所呈现出的问题,如邑田不足、权益再分配、军事负担加重等诸矛盾进行了详细论证,指出正是上述问题导致了西周管内诸侯的离叛,并使西周王朝走向了崩溃。

第二部的上篇《中原政治史的推移》叙述了从周王室东迁到春秋中期的政治史发展,考察说明了覆盖中原的政治社会秩序的动态发展。在第一章《东迁期:周朝的东迁》,首先论证了周朝的东迁是诸侯争霸的重要契机。西周后期随着王位继承出现的混乱,王朝及诸侯国的统治体制相继解体。西周灭亡之后,中原地区具有实力的诸侯国纷纷将周边的小国纳入各自的势力范围。在诸侯争霸的过程中,各诸侯国间的国人因军事的原因,增大了所承受的经济负担,并因此动摇了诸侯对其国人的统治。为解决诸侯之间的纷争,诸侯国之间的结盟应运而生,而盟主也成为当然的霸主。

在第二章《春秋前期:齐之霸权》和第三章《春秋中期:晋国的霸主体制》中,作者对以往学界很少有人深究过的霸主时代的春秋社会结构问题进行了研究,对春秋时期霸主体制的实际状况做了大量细致的考证。作者在第二章分析了齐桓公的霸业以及此前的“小伯”结构状态。在第三章考察了春秋中期占据中原的晋国霸主体制。文中指出齐国一方面维持着与周王朝等“西方”势力互不干涉的政策基调,一方面积极致力于实现统合中原与淮河流域势力的目的。所谓齐桓公“勤王”是一种借助周王朝来获得援助的一个机会,春秋中期的周、齐,处于一种异常的态势之中。另一方面,晋国从西周开始即与周王朝关系密切。依靠周天子的提携得以进出淮河流域。晋文公以偶然的的机会获得了洛阳以东的霸主地位。晋国在统合中原的过程中,周天子的权威是必不可少的。为此,晋国在处理与周天子的关系,确保霸主地位方面确实下了一番煞费苦心的功夫。晋国称霸自召陵会盟之后走向解体。但是尊奉周王朝、统合了中原的晋国,则被视为中原地区政治秩序的唯一模式,并一直影响到战国中期政治史的发展。

在第二部中篇《春秋时期的社会》,作者在此前政治史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春秋

时期的国家制度及国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在第一章《春秋“国”之成立》，作者考证了以诸侯都城为“国”的建立过程。“国”在先秦史文献中被写作“或”，西周时期主要是指“南或”、“東或”等范围很大的军事势力圈。在西周后期的《诗》中出现了将诸侯国的领域称为“邦国”的用例。在记载春秋历史的《左传》中，“国”字则成为诸侯都城的专门称谓。从西周后期到春秋前期国制的再编过程，诸侯国为了强化都市的应对能力，让承担兵役的军人驻扎在城里。于是诸侯国的都城被称作为“国”，随之形成了春秋时期的“国”与“国人”。

在第二章《春秋时期的“国人”》，作者批判了增渊龙夫的观点，论证了《左传》等历史文献中所记载“国人”的真实含义。文中通过分析“国人”和世族的关系，指出以恩惠授受为媒介形成的私人关系，在春秋时代的“国人”身上屡见不鲜。而增渊认为：这种以恩惠授受为媒介形成的私人关系是在战国时代出现的，它的出现是对此前“氏族制的”“共同体的”关系的克服，是一种划时期的变化。吉本在否定这一观点的同时，指出《论语》提到的君臣关系不是基于个人利害基础上建立的人际关系，而是以“道”为客观标准建立的一种新的君臣关系。

第三章《春秋时期的世族》，对春秋时期中原诸国的国家制度上表现出的“世族支配体制”特征进行了论证。所谓“世族支配体制”就是由几家世族世代占有“卿”的地位，并掌握诸侯国政治机构的一种体制。这种体制与“霸权体制”相互补充构成了春秋中期的政治社会秩序。随着霸权体制的衰微，例如卫国的君主打到了世族，建立了“国君专权”的政治格局。中原诸国在战国中期前，君主和世族宗主拥有同样的专权权力。战国后期，为了维持安定的君主专权局面，政治体制全面向官僚制转变，秦汉专制国家就是这一转变的完成形态。

第二部的下篇《边境的王权》，作者在考察完中原诸国之后，笔锋一转，将其视线投向位于中原以外的各诸侯国。第一章《吴国：宗谱的分析》，作者通过《史记》吴世家的宗谱分析，阐述了边境王权在建国方面所表现出的一些特征。春秋中期吴氏家族在吴王寿梦与中原开始交流之际，利用了晋国带来的有关虞的传说。而此前的吴氏宗谱也是利用了传说中与楚国熊严四子有关的记载，即当初吴国自称是长江流域势力最强的楚国的分支，自寿梦以后因为与楚国对抗的中原进行交流，遂又改称吴是周的分支太伯的后裔，以示其与中原国家同源，而与楚国并非同类。其实这些作为不过是为了显示吴国的王权出自于历史悠久的贵族而已，它反映出那些政治体制尚未成熟的周边诸国，非常需要借用外来的力量来壮大自己。

第二章《西周春秋时期的楚国》，作者指出《史记》楚世家中所记载西周时期楚氏的宗谱是根据楚灵王推行国君专权和进出中原的考虑而改变的。此后，与楚国相关的史料表明，周昭王时期楚在熊丽建立，熊罾确立了父子相承体制的王朝，并采用中原“公”的称谓，若敖熊仪时期又改称为“王”。春秋时期的楚国历史，可以分为若敖氏政权、公子政权和国君政权三个时期。世族若敖氏虽然建立了一家支配的独立政权，但是在公元前605年很早就灭亡了。之所以如此，与若敖政权所实施的独家世袭垄断政权所带来的政体结构脆弱性密不可分，这一点与中原世族支配体制的内涵是根本不同的。而若敖周边缺乏足够的防御力量也是一个导致灭亡的重要原因。

第三章《战国中期以前的秦国》，作者在序言中明确指出，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学界对战国中期以前的秦史研究是很不充分的。例如《史记》秦本纪中关于春秋时期秦国的记载，几乎全部取材于《左传》，而《左传》相关记述的内容又极为有限，史料上的缺乏极大妨碍了对这个时期的秦国历史的研究。作者还指出《史记》秦本纪关于襄公以前的记载，是公元前325年惠文王称王之际改变后的记载。秦国在穆公以后也建立了世族支配体制。与秦国不同，中原的世族在与霸主体制的联动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使其与世族国君对抗成为可能，几乎所有中原的诸侯国，世族宗主都成功篡权，确立了专权体制。与此相反，秦国因受到晋国称霸的排斥，世族缺乏建立独自权力的机会，最终君主建立了专权体制。正是由于这样的时代背景，秦国形成了与中原各国所不同的发展特征。

第三部的第一章《战国前期中原霸主体制的再建》，作者指出历来战国史研究有偏重商鞅变法以后的秦史研究的倾向。而且因为《史记》战国纪年的混乱，加大了从时间上把握战

国时期政治史发展脉络的困难。对此，作者曾在1998年撰写了《史记战国纪年考》，对相关史料进行了详细梳理，复原了战国纪年。在此基础上，作者探讨了春秋后期以来三家分晋的发展轨迹，指出战国中期以前的晋国称霸，实际成为了中原地区及政治秩序的唯一样板，此后持续不断试图再建霸主体制的活动，无一例外都是以晋国为样板所进行的尝试。

第二章《专制国家的孕育》，在总括此前研究的基础上，作者评价了商鞅变法及战国前期的各国变法在春秋战国史中的位置及意义，论证了变法对专制国家的形成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吉本的这部专著给读者最大的感受是他在史料方面所下的功夫。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历史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春秋之前的西周时代，金文是最重要的史料来源。春秋以后的金文史料则几乎没有。至于可以补充秦汉历史资料的木简和竹简，在春秋战国时期发达的中原地区尚未发现。战国的楚简和秦简的内容，从区域的角度来看，也都仅仅属于周边国家的史料范畴。这样，研究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主要依靠的是《春秋左氏传》、《史记》等有限的文献资料。翻阅吉本的这本专著，随处可以看到他对先秦时期史料的熟练掌握以及所进行的精密考证与解读，可以说是这一部名副其实的以实证为特征的学术著作。另外，吉本对前人先秦史的研究成果也了如指掌。记得笔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刚到京都大学的时候，就常常听到吉本谈论杨宽先生的论著。此次出版的这部专著引文注释中更可领略到作者对中国学界的熟悉程度。文中举凡考证、结论之处，绝不掠丝毫他人之美，无论观点之大小皆详细注明引文出处。

另外，从本书的研究角度上看，因为春秋时代是殷周史与秦汉史的交汇点，在日本学者中，从殷周期延长线的角度研究春秋时代的是贝塚茂树。此后再无类似的学者。从秦汉史方面追溯春秋史研究的是增渊龙夫。吉本的研究则采用了由战国至秦的视角，这在日本学者中也是极为少见的。

本书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此前研究春秋时代的思维方法主要表现在“霸主体制”与“世族支配体制”两个方面，认为二者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在一般的概说性的书籍中，均称春秋时代是“霸主的时代”，是“五霸的时代”。迄今为止的春秋史研究主要偏重于齐桓公和晋文公以及他们各自所属的国别史研究，对五霸时代的霸主实际状态却鲜有论及。吉本的研究则不同，首先从时间上看，涉及了春秋时期的全部过程，即研究是在以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前四世纪的春秋历史空间为背景的前提下展开的；从地域上看，东至山东齐鲁，西至周、晋，研究目光始终投向当时地处政治舞台中心的广阔地域，正是在这样一个规模的时空范围，作者对历史发展的主线进行了不懈地探求，立体地展现出“霸主体制”和“世族支配体制”的历史原貌。

总之，吉本的这部专著在史料考证、研究角度以及所作出的结论等方面，为先秦史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坐标。因为笔者并非先秦史专业，所以只能就该书的结构与研究方法等方面做一肤浅介绍。对其学术价值，还有待于日后由专家学者进行详细评点。我们希望能以这部著作的问世为契机，将先秦史研究与中日学术交流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收稿日期：**2007-6-9

**作者简介：**胡宝华（1953-），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